

关于“文学花盆”

从前我一直以为,卖花的人因了常年和花朵、植物在一起,面容应该从从容而有生气的,性情也多半会诚朴、安静。但是我在很多时候遇到的卖花人并非如此。他们急躁、冷漠、不诚实。面对你感兴趣的一盆花朵或绿叶植物,茉莉花、君子兰或者龟背竹、巴西树,他们不耐烦向你介绍这些花朵树木的脾气秉性,只急于让那些花出售。当你再三追问该如何养护即将买回家去的花朵,比如浇水的间隔时间,还有哪些花喜欢日照,哪些花喜欢阴凉等等,他们的回答则经常含混不清,他们会应付、甚至打发你似的说,怎么养都行,怎么浇水都行。他们一边说着,一边侍弄着手下尚未出售的花。他们忙着往君子兰肥厚的叶片上涂亮光油,又拿起喷壶往一株名为龙血的树上喷洒叶绿素,接着再给茶花和“仙客来”的盆子里施一点花朵鲜艳剂。经过几番化学喂养的花朵们果然精神非凡,伸着脖子摇晃着油汪汪的头,呈现出某种突击出来的不自然的亢奋——宛若刚刚吸食过摇头丸之类吧?当然不会!

有时我想,如果不恰当地把文学比做花朵和植物,那么作家是种花人呢,还是卖花人呢,像我前边描述过的那样的卖花人?这是一个喧嚣的、求快的时代,花朵也喧嚣。这是一个不求甚解的时代:花卖了,花插在塑料上了,花死了,与我何干?而我们的有些文学,因了时代的种种诱惑和市场的高声催促,又正如那些涂亮光油、打叶绿素、铺泡沫塑料的盆花一样,亢奋、光鲜,却说死就死。我们的有些作家,也正像一些这个时代特有的卖花人一样,每天繁忙地鼓捣着文学“花盆”,却并不爱花,甚至对它急躁、冷漠、不诚实。

新年时我读到法国作家热拉尔·马瑟的散文《年轻人与死神》,其中有一小段叙述令我感触深刻,他写道:“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再次领略到东方人描写命运的方式:没有长篇累牍的叙述,只有一个悄悄的手势或几颗书法字。”我注意到的是作家用几“颗”书法字来形容东方的文字,而不是几行、几段、几串、几磅。在这里,“颗”得到了强调,我突然意识到这强调的宝贵——我的母语,汉字的宝贵。一颗珍珠,一颗钻石,一颗种子,一颗星星……一颗汉字。进而我想到,我们必须重视文字和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宝贵。那些打动我们灵魂、呼唤我们思想的文字不可能是涂满亮光油的、扎根在泡沫塑料里的植物,它们的根系只能谦逊而执著地深埋在厚实的泥土中。就作家所应秉持的信念而言,文字有时的确比生命更重要。不要像卖花人打发花朵那样慷慨“施肥”,不要优待的虐待。面对有难度的文学,有时我们同样需要节制和吝啬,需要尊重文学的本意,就像卖花人应当尊重花朵生长的本意。

今天的社会为什么需要文学?今天的读者为什么要读诗和小说?也许那是因为文学能够呼唤出潜伏在你心中诸多你所并不深知的情绪,从而激起你多样的思想或某些隐秘的美感。你因思想而欢愉,你因欢愉而思想。这时的思想就如中国诗人西川所言:“思想不是填充练习,思想是另起炉灶。思想到极致的人,即使他悲观厌世,他也会独自鼓掌大笑。”

但是,当作家不断企图用如前所述的那些“文学花盆”来打发读者时,文学首先会向作家说再见,接着作家将会被今天的每分钟都有新创意的社会所抛弃。

因此我说,作家要有文学野心,同时要对自己充满警惕。

摘自《中华读书报》1月26日 铁凝/文

学术造假

摘自人民网 宋嵩作

打假

学术造假

小说中的小说

说“小说死了”,小说没有死。但是,小说它皮包骨头,浑身都是巨大的关节。“形销骨立”这个成语已经成为了“小说”最为生动的写真——它还站在那里,只是没了人样。小说之所以还能站在那里,长篇小说给出了非常吃力的支撑。至于短篇小说,即使它还活着,充其量也就是个植物人。

短篇小说的本质其实并不在短,而在它有味道。品尝味道需要时间,也许还需要智慧。小品或段子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30秒钟内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笑出眼泪。短篇小说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就是节日里的家宴。它重要吗?没那么重要。几个人围在自家的餐桌上,各自说一些闲话,言不及义。但是,因为有人生的常态在,有最为基本的生老病死在,家宴比家里人“吃饭”要丰富得多。父亲刚刚做了手术,大家偏偏就不提健康的事;大姐夫刚刚做坏了生意,一桌子偏偏就不提钱的事——这反而变成了潜台词,潜台词所构成的东西也许是意义,也许只是一种无法复制的氛围。如此这般,生活里最生动的局面出现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只是如此这般——多年之后,你的父亲已在天堂,你的大姐夫已在遥不可及的地方,你忘记了餐桌上的每一道菜,可你就是不能忘记老父亲吃鱼头的样子。灯光底下,他没有牙的嘴巴在噘,像没有牙的孩子在弄玩具,像无缘无故的笑。从此,鱼头成了你最亲的人,它让你爱,也让你伤心。最要紧的是,这伤心并不伤人,你的心意愿并一直收藏它——人类内心的收藏欲望让艺术最终成了一种可能,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没什么力量,小说也没什么力量,短篇小说也没什么力量。如果有,那一定是它涉及到了生活或人性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个最核心的内容也许和种族有关,也许和时代有关,也许和历史有关,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和它们通通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有一类被称作“作家”的家伙,他们在私底下偏执地喜爱他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真谛就在这里。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做减法,减去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点,那些被减去的部分成了我们的日子,需要我们去“过”。

摘自《世界文学》2010年第6期 毕飞宇/文

“文化焦虑”弥漫当代社会

一种浓郁的“文化焦虑”,弥漫在当代中国社会。随着国门的打开,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向中国。以节日为例,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狂欢节等各种洋节在我国日益热闹,而国内的很多传统节日则被冷落。尽管我国各地正不断加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我国的物质和非物质传统文化遗产还是在以惊人的速度衰落,城市和乡村里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各地的人文景观随着“旧城改造”和农村模仿城市的时尚建设不断消失。于是,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呼吁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焦虑中有深沉的反思和忧患意识。因为,任何一种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是有延续性的,现代知识和文化的传承不可能以斩断历史的方式来进行。

当下,“文化焦虑”和“文化忧患”促使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教育,但他们过分片面地把中华民族文化等同于汉文化甚至一些儒家古典文化,特别是片面地把所谓的“国学”指称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一说到中国文化,言必称“国学”,视野局限在孔孟儒家之学和“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上,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等同于进行一些儒家古代典籍的教育,不遗余力地在大中小学里进行所谓的“国学教育”。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鲁迅、胡适等一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早已看到了以“四书五经”等为载体的中国汉学典籍中的大量糟粕,所以才振臂呼唤引进“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博采众长,吸收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才创新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新文化。如果依旧拘泥于儒家典籍的故纸堆中,不知今天的中国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格局。今天,享受着新文化运动丰硕果实的我们,不应忘记鲁迅先生等一代哲人那些深沉理性的警示和呼喊。我们是为国忧心、为族忧患的“文化焦虑”中,不能把眼光仅仅盯在自己已有的文化传统上,老想着要不分良莠地一股脑继承过去的文化传统。用一句过去时髦的老话说,我们今天应该“胸怀中国,放眼世界”,不要只顾爱而不释手地捧着“国学”的一些典籍沾沾自喜,而忽略了与时俱进地学习、汲取和创新,忽略了向世界学习,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中国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既要自重又要有自觉意识。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如活水长流,才会有生命力,如果只是固步自封自恋,不思向别人学习和创新,那就会日益成为一个潭死水。“文化焦虑”促使我们忧患和反思,但我们的这种焦虑,应促使我们有准确理性的“文化自觉”,催生不生根本又汇聚百川、广采博纳的当代中华文化文化。

摘自《人民论坛》第2期 杨福泉/文

让音乐回到现场

2005年,我曾经满怀信心地宣称华语歌坛进入了“数字元年”,彩铃衍生的巨大利润让我以为数字音乐产业将挽救华语歌坛。几年过后,几家欢喜几家愁,数字音乐确实烹制出了巨大的蛋糕,然而歌坛本身仍然在嚼着方便面憧憬着未来。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就是当下的歌坛一个侧面——也许刻薄了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华语流行歌坛还有另外一个侧面:有心的音乐人仍然要“上下而求索”,而这一求索渐渐地发现了一丝生机,为了“把根留住”,音乐人开始回归,“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这一首歌就是“让音乐回到现场”。

音乐回到现场在CD伴随电视晚会泛滥的时代曾经只是一个传说,它在今天王者归来并非是哪些人一相情愿的产物,实在是我们这喧嚣浮躁的时代所引发的一场平民风潮。

曾几何时,我们太习惯于在虚假中生活,起初是电视台,然后是互联网提供的虚拟世界真切得让人们已经忘记了泥土的芳香,高度发达的录音录像技术让我们沉溺在虚拟的完美之中。终于有一天,当虚拟也可以令人窒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有时候跑音才意味着真实,缺陷才表达着完美。

让音乐回到现场,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华语流行歌坛重新绽放的前提。十余年来,华语歌坛创造力的不振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就仍然需要呼吁我们的音乐人少点娱乐精神,多点艺术责任——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人供人娱乐了,不太需要音乐人去添乱。音乐人固然没什么清高,至少还应该以声传情,直指人心。

摘自《艺术评论》第2期 金兆钧/文

“灰姑娘”的困境

拉居然拒绝了这位富家公子的求婚,理由是她不想“在找到自己之前,迷失在别人的生活里”,她还想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独自开辟一番事业。为此,她付出了代价。这部作品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婚嫁重要,还是事业重要?是物质重要,还是心灵重要?

类似这样的主题如果放到中国的语境里,可能只能被嘲讽。不入豪门富家门,偏守寒门独独门,这就变成了当下常被嘲讽的“剩女”:活该她们去过穷兮穷兮冷兮的“剩女”的生活——这样的女子,在世俗的眼里,属于病姑娘。可是我却要为病姑娘病姑娘叫好,为西布拉喝彩,为她内心的自我守护唱赞歌。

婚嫁和事业,并非注定是“你死我活”,绝对对立。但也确实常常产生冲突与困境,尤其是对于女性。在此困境中,孰先孰后,孰重孰轻?聪明的灰姑娘能否找到一个灰色地带的平衡点?倘若能,那自然是“很幸福”的了;倘若不能,那我主张,还是要“培物质,张灵明”(鲁迅语),高举心灵的旗帜,守住独自支撑的那点微弱的灵光。

摘自《万象》第1期 刘剑梅/文

让郭晶晶当官是滥用公权力

郭晶晶要退役,没有人担心她退役后找不到工作。因为眼下“赛而优则仕”的惯例,她拿到了事业单位“铁饭碗”。甚至她2007年还在国家队训练比赛时就已经是河北省体育局运动中心的副处级干部了。就在郭晶晶提出退役申请的前后,浙江省体育局帮助15名退役运动员集体登报求职,这其中虽有杨雨这样的游泳世界冠军,但更多的是成绩不够突出或非冷门项目的普通运动员。

一方面,许多退役运动员就业难是客观现象,甚至出现了“冠军搓澡工”这样轰动一时的例子;另一方面,金字塔塔尖的

## 美术馆图书馆“免费”何时开始实施

文化部、财政部要求全国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站)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意见》一出台,“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什么时候开始免费开放”就成网友点击率极高的热门话题。

日前,全国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在“免费开放、免费服务”方面的意识和相关规定差距颇为悬殊,免费举措步伐不一。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上海、杭州等地,早已开始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免费”甚至“免费派送”到市民身边。

以上海图书馆为例,免费开放之前,上海市民到图书馆阅读,要办一张工本费15元的借阅读证。而在图书馆寄存随身行李,每次都要交付1元硬币。如今,读者进入上海各大图书馆,可以免费寄存、办证、阅览,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上海图书馆日前还为读者提供了无线上网区域。

事实上,由于受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限制,眼下全国不少公共图书馆在提供服务时,还在收取一定的成本费,包括借阅读证的工本费、重要文献的检索、复印费等。如果这些收费项目也逐渐免费,有待政府加大投入。

与图书馆相比,全国美术馆的免费开放要应对更多挑战。因为美术馆展出的艺术品价值较高,免费开放意味着要升级艺术品保护的硬件措施,增加安保人员,必须跨过“经费增加”这一

我们从儒家那里继承什么

在我看来,儒学当中,可继承的东西很多,比如“仁”。

仁爱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学是孔孟的卓越贡献。它的基础,是一种“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证自明”的“人性的善”,这就是“亲亲之爱”。既然是“亲亲”,那么,子女要爱父母,父母也要爱子女,这就是“对等相爱”。同样,亲兄弟要爱,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当于兄弟的乡亲、同学、战友、异族和外国人,也要爱。这就是“顺序延伸”。于是,从纵向的孝和横向的悌出发,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让世界充满爱。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

何况做起来也不难,不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忠恕之道”。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别人,有什么难呢?就算没能力帮助别人立,帮助别人达,不嫉妒,不破坏,不阻挡,总做得好吧?

如果连这也困难,那么,还有“侧隐之心”作为底线。前不久,许多媒体都相继报道了当年的红卫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让人震撼。其实反过来想,如果那时他们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会去对老师和长辈恶语相加,拳打脚踢?也就没有后来的良心谴责和内心煎熬了。“于心不忍”这“一念之善”,岂非极其重要?

这就是孔孟的“仁学体系”。它有一个靠得住的基础(亲亲之爱)、一个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还有一条做得到的底线(侧隐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空头支票”,这很了不起。

不过更重要的,还在于仁爱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实上,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没有哪个民族,会把仇恨当作核心价值观。因此,尽管孔孟仁学当时就遭人诟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质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尽管它的某些具体内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处,但它的基本内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继承的。

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就弘扬之;不符合,就抛弃之。这就是我主张的取舍标准。

摘自《南方周末》1月20日 易中天/文

道“槛”。

由于此前全国博物馆在免费开放过程中遭遇了“客流井喷”的尴尬,也有不少人在担忧:美术馆、图书馆的免费之门打开时,同样会人满为患。“免费开放了以后服务是否跟得上”,“门票预约过程是不是很繁琐”,成了网民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据了解,一些已做好免费开放准备的美术馆、图书馆对此也“严阵以待”,准备采取电话预约、限制入馆人数等方式,迎接可能出现的大客流。

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赢得老百姓一片叫好声。但如何把免费的“文化大餐”、“艺术大餐”烹饪得更加精彩诱人,如何给国人提供更细致、人性化的服务,增添城市的人文气息,提升市民的艺术素养,才是公共文化场馆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河南等地,博物馆的免费开放在短期内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参观,但一段时间之后,又陷入冷清局面。“公众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公共文化场馆是否免费开放,也包括展览内容是否吸引人。”

专家指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高素质,与其城市中比比皆是、免费开放且展览水准很高的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有着很大的关系。眼下,我国公共文化设施从过去的低廉收费和象征性收费,最终过渡到全面免费,是社会进步的一张“试纸”,不仅惠及社会公众,意义也尤为深远。

摘自新华网2月12日 孙丽萍、许晓青/文

低层次模仿『杂耍化』祭天表演唤不回尊重

今年春节期间天坛举办的“祭天盛典”,短短几天时间,吸引了31万游客,从商业角度看取得成功。然而,在网上,它却招来一片指责之声。“为什么要再现史上最腐败王朝的祭天仪式”、“祭天舞酷似黑社会的斧头帮”、“搞这么多多人扮演太监,弘扬的是什么文化”、“沉迷皇权,彻头彻尾的一副奴才嘴脸”……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祭天盛典,本是中华民族用来表达终极关怀的重要仪式,面对现代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从传统中寻求慰藉,也属人之常情,可为什么大家并不知情呢?不仅没呼唤起人们的尊重感,反而斥之为“滑稽戏”?

对此,民俗学家高巍报以苦笑:“这只是表演,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正是因为高度重视,肃穆对待,才使祭天超越了仪式层面,给人们的精神带来神圣感和超越感。因此,只复归形式,不复归内涵,难免沦为表演,甚至被“杂耍化”。高巍认为,这种“仪式”搞得越隆重,结果就越危险,因为明摆着是假的,和现代社会之间找不到结合点,对于懂的人来说,这种低层次模仿漏洞百出,近似儿戏,根本不可能唤起尊重感。与其这样,不如干脆艺术化处理,这样至少还能更通俗、更富娱乐性。

原本严肃的祭天,被搞成表演,体现了祭祀本身的尴尬。事实上,祭祀是几千年文化积淀客观形成的,通过祭祀,人与自我达成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心灵因之得到净化和提升。在历史上,祭祀一直起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应一概否定。以祭天来说,古人概念中的“天”并非天空,它代表的是冥冥中的力量,所以《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重视天,将祭天仪式搞得异常隆重,并非源于愚昧和迷信,而是将它作为净化人心、实现和谐、警醒自我、达成良治的手段。而在敬天法祖的传统中,缺失了祭祀这一关键环节,则这些美好的价值观很容易成为无本之木。

今年庙会,一个突出现象是人们对传统越来越关注,高巍认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今天人们去庙会已脱离了吃与凑热闹的低层次需求,更希望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满足。

摘自《北京晨报》2月15日 陈辉/文